

布哈林文选

人 民 大 学 社

布 哈 林 文 选

下 册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参加本卷编选和译校工作的有：
宋洪训、杨彦君、李吟波、张钟朴、
王锡君、鲍世明、孙开焕、刘 焱、
王全民、张启荣、刘淑春。

布 哈 林 文 选

下 册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75印张 330,000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

书号 17001·102 定价 1.65元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的理论）

(1912—1914年)	1
代序言	1
导言 马克思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4
第一章 边际效用论的方法论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基础	23
第二章 价值理论	50
第三章 价值理论（续）	69
第四章 利润理论	105
第五章 利润理论（续）	125
结束语	153
附录 理论上的调和主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价值 理论）	158

司徒卢威先生的魔术（1913年）..... 169

一、“论经济思维发展中的某些基本哲学动机”，或者忽然把 马克思变成了中世纪的神父	169
二、“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或者生产关系的神秘的消失	172
三、“社会经济过程的基本两重性”，或者把信仰变成科学预言 以及其他有趣的魔术	175
四、“关于价格和价值的某些基本论点”，或者从一无所有中创 建政治经济学	177

无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分配论)(1913—1914年)·····	181
自由社会主义的理论(1914年)·····	204
一、价值理论·····	205
二、剩余价值理论·····	213
三、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 资本积累和“人口规律”·····	221
四、自由社会主义·····	229
柏姆-巴维克的主观价值论(1914年)·····	232
一、效用和价值。价值量·····	233
二、关于替代效用的学说·····	240
三、财货在不同使用方法下的价值量。主观交换价值·····	241
四、生产资料的价值·····	242
帝国主义强盗国家(1916年12月)·····	245
一·····	245
二·····	247
三·····	249
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理论探讨)(1925年)·····	251
前言·····	251
第一章 抽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扩大再生产·····	252
第二章 货币和扩大再生产·····	279
第三章 整个市场的理论和危机·····	300
第四章 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332
第五章 资本主义崩溃论·····	353
结束语·····	364
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摘录)(1928年7月18日)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	
执委会活动的报告·····	367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总的分析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形式	
战后发展的三个时期·····	367
技术进步的因素·····	369

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及其政治意 义·····	371
结构的变化·····	373
力量配置的变化·····	376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 报告(摘录)(1928年8月9日)·····	379
世界革命过程的多样化	
苏联的经验·····	379
殖民地的作用·····	380
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问题·····	382
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	384
几个经济问题	
我们对崩溃论的论证·····	386
关于金融资本的争论·····	386
关于危机的理论·····	388
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问题	
我们意见分歧的实质·····	391
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市场关系·····	392
关于“战时共产主义”·····	394
资产阶级理论家对现代资本主义某些问题的看法 (1929年5月24日)·····	396
“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理论(1929年6月)·····	415

食利者政治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的理论)

(1912—1914 年)

代 序 言

本书于1914年秋，即在世界大战初期就告完成，而序言则写于这一年的8—9月间。

我早就想对最新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学进行系统的批判。为此目的，我侥幸逃出流放地后就住在维也纳，并在维也纳大学听柏姆-巴维克讲课，而他现已去世。在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内，我只好主要研究奥地利学派理论家的著作。但在维也纳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奥地利政府在大战前把我监禁起来，手稿也被看守仔细检查过。我被驱逐到瑞士，洛桑大学图书馆使我有机会就地研究“洛桑学派”（瓦尔拉斯）和旧经济学派，从而彻底研究边际效用论。我在那里还开始研究英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后来，由于政治活动的需要，我又被派往瑞典，那里有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还有高等商学院的专门经济图书馆，这使我能继续研究最新资产阶级经济学。我被逮捕并遣送到挪威，这使我能进入克利斯提阿纳诺贝尔大学图书馆。后来，我到美国以后，就更详细地——又是就地——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读美国经济学著作。

手稿长久丢失在克利斯提阿纳的某个地方，我的朋友挪威共产党人阿尔维德·汉逊（Arvid G.Hansen）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找到，并于1919年2月带到苏维埃俄国来。我现在只对手稿作了一

些评语和注释，主要涉及到英美学派和近几年来的一般出版物。

这就是本书的“外史”。

至于事情的实质，则如下述。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对最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主要归结为两种批判，或者只是社会学的批判，或者仅仅是方法论的批判。例如，只要肯定某种理论体系同一定的阶级心理有血缘关系，就算完了。或者指出一些方法论的论据，指出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人们认为对体系“内在”方面的批判是多余的事情。

当然，如果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才是客观上正确的，那就只要暴露出某种理论的资产阶级性，严格地说，就足以把这种理论取消。实质上，问题也是这样。因为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普遍意义，正因为它是最先进阶级的理论体系，这个阶级的认识论上的“危害”，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保守的、因而有局限的意识难对付得多。但是很清楚，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恰恰必须通过对敌视我们的体系进行逻辑批判，才能揭示出这个真理。因此，它们的社会学的特性决不能使我们推卸在纯逻辑批判的范围内进行斗争的义务。

对于方法论的批判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如果弄清方法论的起始论据是错误的，就会推倒全部理论体系。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要求，要用理论体系中部分结论的错误来说明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或者用体系内在的矛盾来说明，或者用在“本性上”没有能力概括这门学科的一系列重要现象的事实来说明。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应当对最新的理论做出全面的批判，这种批判既要包括社会学的批判，也要包括方法论的批判，包括对整个体系的各个部分的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做的（参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只限于对“奥地利”学派进行社会学

的和方法论的批判，那么它的资产阶级的反对者则主要从部分结论的不正确性上对它进行批判。只有几乎是孤家寡人的鲁·斯托尔滋曼曾试图对柏姆-巴维克进行全面的批判。而且，由于这位作者的某些基本论点在理论上同马克思主义相类似，所以在对“奥地利派”的批判中也表现出相似之处。甚至在没有熟悉斯托尔滋曼的著作之前，而得出象他一样的结论时，我也认为有必要指出这种一致之处。但尽管斯托尔滋曼有一切长处，可是他所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社会观点，即把社会看作“目的产物”。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一位十分机智的追随者罗·利夫曼，他曾使这一理论深化并突出其一切特点，他对付斯托尔滋曼的办法恰恰是攻击后者的目的论，这就不是偶然的了。这种目的论的观点，除了明显的强词夺理的语调以外，使得斯托尔滋曼不能在应有的理论范围内对奥地利学派进行批判分析。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完成这项工作，而进行这项工作的尝试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发表。

关于批判对象的选择，无需作详细解释。举世公认，马克思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

正当欧洲内战如火如荼时，我决定出版这部著作，人们可能感到吃惊。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最残酷的阶级搏斗中也从来不应停止进行理论工作，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这样作的话。可能有更厉害的反对意见，认为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荒谬的，因为它的客体和主体现在定将被埋葬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烈火中。但是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了解当前的时局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既然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为这种了解开辟道路，所以就保留了它的认识上的价值。

关于论述的方法，我只想再说几句。我尽力论述得简短些，因此论述就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我从奥地利学派，也从数学派、英美学派等等那里引用了许多话。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有很大

的偏见，反对这种方法，认为这是虚有其表的独特的“学识渊博”。但是我认为，在这里应当加进一些历史文献注释，顺便使读者了解主题的文献，哪怕大体上知道一下这些文献的情况。而了解自己的敌人决不应受指责，况且我们对敌人很少了解。此外，注释总起来说也包含对资产阶级理论思想的其他支脉所进行的顺便的和系统的批判。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向我的朋友尤里·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表示感谢，我同他多次讨论有关理论经济学的各种问题，他的宝贵指示总是引起我的重视。

本书献给伊·列·同志。

尼·布哈林

1919年2月底于莫斯科

导 言

马克思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1. 德国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的社会学特征。它的逻辑特征。2. 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的社会学特征。它的简明的逻辑特征。3. 英美学派。4. “奥地利学派的先驱”

自从十九世纪伟大思想家“炯炯发光的双眼”永远闭上以来，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他的思想曾经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杠杆。同时，最近几十年来的整个经济演变，——一方面，资本迅猛积聚和集中，小生产甚至在最偏僻的地方也被排挤，出现了由金皇冠加冕的强大的“工业大王”，另一方面，“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

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①无产阶级大军增长起来，——这一切大大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正确，他为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起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后来在《资本论》中获得充分而完整地阐述的那些预言，已经有十分之九得到了光辉的证实。这种预言的最重要部分之一——集中的理论——现在已成了普遍东西，作为公认的真理成为科学的常规。诚然，它通常被披上其他的理论外衣，它失去了马克思理论所特有的那种严整性；但是，把它只看作乌托邦幻想的那种“经济浪漫主义”已经彻底垮台，因为最近一些年来，马克思所揭示和解释的趋向已经急剧地和大规模地显露出来，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大生产的胜利进军。如果说某些好心人在股份公司身上只看到“资本民主化”，温情脉脉地认为它们保障了社会和平和普遍福利（遗憾的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队伍内也有这种人），那么现今的“经济材料”最深刻地打破了这种市民的田园诗，因为股份资本变成了一小撮残酷镇压“第四等级”的一切前进意向的篡夺者手中的强大武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马克思的理论结构是多么重要的认识论的武器。甚至现在才出现的那些资本主义演变的现象，也只有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才能弄清楚。^②强大的企业组织辛迪加和托拉斯的成立，规模空前的银行组织的出现，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渗透，“金融资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霸权——这一切只不过是使马克思所分析的发展趋势复杂化罢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只不过大大加速积聚螺旋桨的运动，并把生产变成社会化的生产，使之成熟到在社会监督下实行过渡的程度。诚然，资产阶级学者们前不久在宣扬，企业主组织将消除生产

①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31页。

② 在这方面，鲁·希法亭的著作《金融资本》大有教益（伊·斯切潘诺夫的俄译本《金融资本》）。

的无政府状态和消灭危机。可是，唉！资本主义机体依然周期性地全身抽搐，只有十分幼稚的人才能说，用改良主义的补钉这种“玫瑰油”能够治好上述这种病症。资产阶级已“跑遍”全球，它的历史使命已近尾声。无产阶级最广泛活动的时期正在到来，它的斗争现在超出了民族国境，越来越具有群众对统治阶级施以压力的形式，而且接近实现运动的最终目的。马克思理论的基本预言的实现，已为期不远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但是，尽管所有这些事实都令人信服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正确，然而它的成就在官方学者中不仅没有扩大，而是迅速地化为乌有。如果说过去在落后国家（如俄国，部分地在意大利）甚至连大学教授也不反对向马克思献媚，当然他们同时加进了自己的“修改”和“小小修正”，那么今天，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联合的加强，抛弃了这种“中间类型”的态度，代之而起的是披着普鲁士、奥地利或（更时髦的）英美式外衣的“纯欧洲的”、现代的学者^①。资产阶级能把两种基本经济思想流派同卡·马克思的坚强体系相对立；我们指的是所谓“历史学派”（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施穆勒、卡·毕歇尔等人）以及最近时期广为传播的“奥地利学派”的学说（卡尔·门格尔、柏姆-巴维克、维塞尔）。这两个流派标志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但是，这种破产表现在两种完全对立的形式上。这就是说，在第一个流派那里，资产阶级抽

^① 因此，“新”理论的成就根源于社会心理学已变化的关系，而不是根源于这种理论的逻辑的完善。资产阶级对劳动理论十分厌恶的原因之一，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的十分厌恶。柏姆-巴维克本人对此承认了一些，他写道：“诚然，依我看，最初的劳动价值论几年来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而迅速传播，但在最近几年中，在一切国家的理论家的眼里，而主要是在‘边际效用’论的影响下，它无疑是破产了，而边际效用论的拥护者越来越多”（见《资本和利润》，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编译，第415页注）。为什么正是在“奥地利”理论中更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摒弃呢，这在下面就要谈到。

象理论的破产表现在对任何类似的理论根本采取否定的态度，而第二个流派则相反，它试图创立的正是这种理论，但只导致一系列异常巧妙地杜撰出来的“表面解释”，这些解释首先正是在马克思理论最强有力的问题上，即在现代资本主义变动的问题上，遭到了破产。众所周知，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力图找到表达经济生活的最普遍规律即“抽象”规律的公式，如它的杰出代表李嘉图作出了抽象演绎法研究的绝妙榜样。相反，“历史学派”作为对古典学派的“世界主义”和“永恒主义”（克尼斯）^①的反动面目出现。这种差异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古典学派的理论鼓吹自由贸易，它尽管宣扬“世界主义”，但却是非常民族的东西：这是英国工业的必然的理论产物。英国由于一系列情况而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它不怕任何人的竞争，不必采取任何“人为的”即立法的措施来战胜其他对手；因而英国工业不必求助于“真正英国的”发展条件，以便证明关税壁垒的必要；因而英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不必把注意力集中在英国资本主义的专有的特点上：尽管他们是英国资本利益的代表，但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经济生活的规律。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经济 development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②。同英国相比，德国这个“历史学派”的发源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新兴的德国工业由于英国的竞争而深受苦难；特别是德国的重工业受到英国的竞争。这样，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不必强调民族特点，那么德国资产阶级必定特别注意民族特点，以便通过德国发展的“特殊性”、“独特性”等等，从理论上论证“保护性”关税政策的英明。理论的兴趣正是要说明历史上具体的东西和民族局限的东

① 克尼斯说的“世界主义”，指的是古典学派把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规律看作适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永恒主义”指的是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参看卡尔·克尼斯《从历史观点看政治经济学》1883年新版第24页）。

② 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可以说是历史主义的第一个理论家（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于1841年出版），他提出了实行关税政策的要求。

西；理论中进行的选择和提到首位的，正是经济生活的这些方面。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历史学派也是德国资产阶级增长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德国资产阶级害怕英国的竞争，要求保护民族工业，因而着重强调德国的“民族的”和“历史的”特点，然后再通过概括方式强调其他国家的这些特点。不论是古典学派还是历史学派，从社会形成过程来说，都是“民族的”，因为这两个流派都是历史上和地域上有限发展的产物。从逻辑的观点来说，古典学派是“世界主义的”，“历史学派”是“民族的”。因此，历史学派的摇篮是德国的关税保护主义。历史学派在自己进一步发展中又产生出一系列派别，而它的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首的最主要的流派（所谓“青年历史学派”或“历史伦理学派”）带有保守的农业的色彩，使中间生产形式理想化，特别是使大地主和农业工人之间的“宗法”关系理想化，害怕“无产阶级祸害”和“红色危险”，这一切充分暴露了这些“客观的”教授，揭示出他们的“纯科学”的社会根源^①。从这种社会学特征产生出历史学派相应的逻辑特征。从逻辑方面来看，“历史学派”的特点，首先是对抽象理论采取否定态度。对这种研究深恶痛绝是他们的基本情调；甚至连这种研究的可能性本身也被怀疑，有时被直接否定；在这类学者看来，“抽象”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有的则对任何科学最重要的概念——“规律”的概念抱怀疑态度，最多只接受由历史经济的和统计的研究所揭示的所谓“经验的规律”。^②这样，就出现了狭隘的经验主义，害怕作广泛的概括；这个

① 例如，请看阿·米克拉舍夫斯基所列举的古·施穆勒的“所作所为”：“他要拖延实行国家对工人的保险，反对推广保护农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的工人立法……对于农业工人，他认为可以在破坏契约时行使刑法，反对承认职工和工人联合会，赞同实行反社会主义者法……”（《政治经济学史。十九世纪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和理论原理》1909年尤里也夫版第578页）。

② 例如，历史学派的极温和的追随者之一F·诺伊曼说，“准确规律的可能性已经从经济领域排除出去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载于《总社会科学杂志》，1892年

学派的极端代表提出积累具体历史资料的口号，而把总结性的理论工作推迟到以后某个时期去。请看它的首脑施穆勒是怎样说明历史学派的“初期积累”的吧。他说：“年青历史学派同他（即罗雪尔。——布哈林注）的区别在于：它不急于总结，它感到急需从收集一般历史资料转而专门研究各个时期、民族和经济现象。它首先要求进行历史经济的专题研究，它更愿意阐明个别经济机构的全部发展，而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它主张采取历史的法的研究的严整方法，但竭力借助旅行和问题本身来充实书本知识，并吸收哲学、心理学研究的资料。”^③

这种原则上同抽象法相敌对的立场，在德国时至今日仍占上风。不久前（1908年）这个古·施穆勒还说，“我们还在加倍做准备工作和收集材料”^④。

在具体要求方面，“历史”流派还有另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它认为社会经济生活完全不能脱离生活过程的其他方面，特别是不能脱离法和道德，尽管这种（理论的）脱离是由认识的目的所迫切要求的。^⑤这种观点正是由于讨厌抽象而产生的；其实，人类社会生活过程就是统一的流，实际上只是一个历史，而不是各种不同的经济史、法律史、道德史等等。只有科学抽象才把统一的生活分成若干部分，人为地分出各种现象，按一定的特征分门别类。因此，反对抽象的人，也一定要反对把经济生活从法的生活和伦理生活

谢夫莱出版，第48年卷第435页）。关于“典型的”概念，同一个作者写道：“那里（即在自然科学中。——布哈林注）有典型的东西，由此又产生典型的东西，并可以作为典型的东西来研究。这里（即在社会科学中。——布哈林注）据说……典型的东西是臆想出来的，即虚构的。”（同上，第442页）

③ 古·施穆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1908年莱比锡版第119页。

④ 同上，第123页。

⑤ 施穆勒提出流派的三个“基本思想”：（1）承认思想的发展。（2）进行心理学道德的考察……（3）用批判的态度对待利己主义的自然科学，象对待社会主义那样……（同上，第123页）

中分出来。当然,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然,说社会生活是统一体,这是对的;但是不应当忘记,没有抽象就不可能有认识;概念本身就是从“具体”东西抽出来的;任何的描述同时也就是要求按照从某方面看认为重要的特征而对现象作某种选择,因此,抽象就是认识行为的必要特征;当抽掉具体特征就会使抽象变成完全空洞的东西,即认识上无益的东西的时候,而且只有当这种时候,抽象才不容许存在。

认识要求分解统一的生活过程。后者十分复杂,为研究起见必须把它分为一些单独的现象。那么,如果在这里,只因经济生活是由通过语言互相联系的人们进行的,语言学所研究的要素就同经济生活要素一起以同样的身份进入经济生活的研究,那么经济生活的研究会产生什么情况呢?显然,每门科学都可以使用其他科学的成果,只要其他科学有助于理解该门科学本身的对象,但是同时,这些别的要素本身应当从该门科学的观点来加以考察;这只是某种辅助材料——仅此而已。

因此,各种材料的堆积并不会减轻,反而会加重认识的困难。此外,“历史学派”在研究最后的形式时,他们所进行的“心理道德的考察”具有道德评价和教训的形式。在以揭示因果关系为目的的科学中,加进了完全无关的道德标准因素(由此就产生“历史伦理学派”这个名称^①)。

历史学派活动的结果,出现了大量历史描述的著作:价格、工资、信贷、货币等等的历史;但价格和价值的理论、工资理论、货币

^① 关于伦理学,H·迪策尔说得很明确:人们可以象说“伦理的”人类学、生理学等等一样,同样可以说“伦理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史(《理论社会经济学》第33页。又参看艾·查克斯《国民经济学的实质和任务》1884年维也纳版第52页)。同样,莱昂·瓦尔拉斯嘲笑理论中的“道德”,把道德化的企图和“使几何精神化”的企图等同起来(莱昂·瓦尔拉斯《社会经济的研究。社会财富调整论》1896年洛桑—巴黎版第40页)。

流通理论的研究工作却寸步不前。同时任何人都清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实，一个问题是近三十年来汉堡或伦敦市场上价格的统计；另一个则是加利阿尼、孔狄亚克、李嘉图的著作中的一般价值和价格的理论”^①……而否定“一般理论”恰恰就是否定政治经济学这门独立的理论学科，也就是承认它的破产。

一般说来，科学能够抱有两个目的。它或是描述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或是力求引出那些总是形成公式的现象的规律；如果有A、B、C，那就必然会有D。在前一种场合，科学带有个体记述的性质，在后一种场合则带有序列规律的性质^②。很明显，政治经济学理论属于第二种类型的科学；它把认识的序列规律任务提到首位。因此，历史学派轻视得出“一般规律”，从而实质上根本取消了政治经济学，代之以个体记述性的“纯描述”，把它融化在经济生活史和经济统计学这门实质是个体记述的科学中。它不能把自己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的思想（Entwicklungsgedanke）——纳入理论研究的范围，结果便象福音书中的无花果树一样不能结果了。它的积极作用只是为理论研究提供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派”的著作是十分宝贵的东西；只要回忆一下“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所出版的有关德国手工业、小商业、农业无产阶级等等的大量著作就可以了^③。

① 路易·科萨《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言》1892年米兰第5版第15页。

② 亚·亚·丘普罗夫（儿子）提出的术语。见他的《统计学概论》1909圣彼得堡版。里凯尔特和文吉尔班特类似的术语有别的意思。

③ 手工业得到了特别详尽的研究。为什么呢？古·施穆勒回答说：“只有保存广泛的中间等级，才能使我们免于在最后遭到这样一种政治发展局面，即由金融利益的代表和第四等级轮流统治……只有它（社会改革。——布哈林注）才能使知识和精神贵族居于国家之首”（古·施穆勒《关于社会政治和国民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1898年莱比锡版第5、6页）。